



卷一

付印

此書為中國婦女史，中國婦女史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此書之研究，在於人與社會之關係，而不在於社會之制度，故其研究之方法，與社會學之方法，迥然不同。



聞一多

新論

◆ 苏志宏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闻 一 多 新 论

苏志宏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一多新论/苏志宏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12
ISBN 7-80109-352-6

I. 闻… II. 苏… III. 闻一多(1899~1946) - 文学研究
IV. 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914 号

闻一多新论

苏志宏 著

特约编辑:郝丹立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cctp @ public.east.cn.net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

印 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0.75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80 元

鸣 谢

我首先衷心感谢我的妻子郝丹立,多年来,她总是作为我的好助手给我以莫大的鼓励和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李燕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感谢田晗先生为本书作的精心的装帧设计。

最后,我对我所在的学校——无锡教育学院和中文系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为本书作为院级课题的立项,以及在时间、经费等方面提供的种种方便、理解和支持,对他们这种奖掖学术研究的胸襟,表示诚挚的谢意和由衷的钦佩。

目 录

绪论 闻一多研究 50 年的回顾与反思	(1)
---------------------------	-------

诗 人 编

第一章 闻一多个性素质的逻辑起点	(31)
------------------------	------

第二章 理想主义的爱国诗人	(47)
---------------------	------

第三章 唯美主义的文化倾向	(62)
---------------------	------

第一节 文化爱国视野中的平民与文化	(62)
-------------------------	------

第二节 “纯形”唯美的美学向度	(68)
-----------------------	------

第三节 “相体裁衣”的音乐美感	(74)
-----------------------	------

第四章 时代的鼓手	(79)
-----------------	------

第一节 “斯文滔滔讨人厌”	(80)
---------------------	------

第二节 “效率”与“价值”兼顾的诗歌发展论	(83)
-----------------------------	------

第三节 用“鼓的情绪”替代“管弦的情绪”	(87)
----------------------------	------

学 者 编

第五章 上古神话研究	(96)
------------------	------

第一节 “生殖机能宗教”的文化进化模式	(96)
---------------------------	------

第二节	“图腾主义”的民族融合历程·····	(105)
第三节	对闻一多神话学研究的几点看法·····	(108)
第六章	《诗经》研究 ·····	(117)
第一节	通过想像“悟入”古代“诗人心理”的运思途径 ·····	(119)
第二节	“生物—社会”、“本能—环境”的还原法 ·····	(125)
• 第三节	“母性意识”的人文批判锋芒·····	(127)
第四节	闻一多《诗经》研究的方法论和学术价值·····	(132)
第七章	《楚辞》研究 ·····	(143)
第一节	关于屈原的研究·····	(143)
第二节	《楚辞》的文字校正和词义诠释·····	(156)
第三节	关于《九歌》的研究·····	(162)
第四节	闻一多《楚辞》研究评价·····	(185)
第八章	《唐诗》研究 ·····	(187)
第一节	诗的唐朝及唐代诗歌的演进·····	(187)
第二节	回归与超越——唐诗发展的动力学特征·····	(199)
第三节	“‘美’是碰不得的”——唐诗研究中的唯美取向 ·····	(207)
第四节	闻一多唐诗研究评价和思考·····	(220)
第九章	《庄子》、《周易》研究 ·····	(224)
第一节	《庄子》研究·····	(224)
第二节	《周易》研究·····	(241)

第十章 闻一多的文化史观	(264)
第一节 传统诗歌的文化特征及其发展.....	(266)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诗学气质.....	(274)
第三节 传统文化的小说戏剧转向.....	(282)
第四节 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文化史观.....	(287)

斗 士 编

第十一章 和教授阶级算账	(295)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民主自由.....	(295)
第二节 里应外合地彻底打倒孔家店.....	(301)
第三节 和教授阶级算账.....	(306)
第十二章 两极之间的中间人	(318)
后 记	(329)

绪论 闻一多研究 50 年的回顾与反思

一

今年——1999 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勇敢地反抗国民党专制主义统治的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诞辰 100 周年。

闻一多，原名亦多，字友三，号友山，族名家骅。到了北京清华学堂上学后，改名多，笔名一多。“一”字是其同学潘光旦建议后加上去的，“一多”于是就在五四以后一直沿用了下来。

1899 年 11 月 24 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月二十二日），闻一多诞生于湖北省蕲水县巴河镇望天湖畔闻家铺。1910 年 12 岁时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念书。1913 年 14 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2 年 7 月毕业旋即留学美国，1925 年学成回国。1925 年至 1932 年，分别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职或任教。自 1932 年 9 月起一直到 1946 年 7 月，一直在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46 年 7 月 15 日，闻一多在昆明作了抗议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演讲后，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终年 48 岁。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开明版）中说：“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

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1929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1944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大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①

朱自清的这段评价性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诗人、学者和斗士“三重人格”贯穿闻一多的一生并在不同的阶段“或隐或现”;二是对这三个人生阶段年代的划分,基本上同闻一多思想发展的历程相吻合。本书作为闻一多思想发展历程及其内在意义评价的研究,采用了这种阶段性的划分方式,即按“诗人编”、“学者编”和“斗士编”的顺序排列,其分量也正好是学者编最重,诗人编次之,斗士编最少,与朱自清所说的“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相合;而上引文字的第一点,即三重人格贯穿一生且或隐或现,事实上已经指出了进行闻一多研究所应遵循的理路——以本人的“人格”即思想发展的内在特征为基本线索进行梳理,方能比较真实地再现闻一多与现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关系。这本应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但是,由于闻一多反对专制主义的英勇献身的史实所发生的年代,与本世纪中国历史变迁——国民党政权的溃逃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自1946年以来迄今53年的闻一多研究,一直游离于闻一多本人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外,凸现的是其中所具有的某种意识形态价值,即一种外在的评价,而关于诗人尤其是学者的闻一多所具有的文化史和学术史价值,却一直鲜有人问津。这样一来,闻一多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性的象征符号,而他的丰富

① 《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卷,第442页。以下再引《闻一多全集》,均出自同一版本,故不再注明版本。

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现代文化史上所应有的地位,在这种象征性符号的光耀之下被掩隐了起来。而这,对于一个将主要的精力贡献给现代诗坛尤其是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兼诗人的闻一多来说,就显得有欠客观和公平。

二

建国以来闻一多研究的主流,如果用一句比较粗略而又概括性的话来说,即为:它基本上是一种外在工具性的研究,而非内在本体性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郭沫若 1947 年夏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以下简称“郭序”)中所表达的观点。郭沫若虽然不是成立于 1946 年 11 月由朱自清为召集人的清华大学“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的成员,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在 1947 年酷热的暑天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将《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仔细校读了两遍,“校补了一些誊录上的错误和夺落,填写了一些古代文字,更把全部的标点统一了”^①,并于同年 8 月为《全集》写下了《序》。

“郭序”对闻一多的传统文化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使用了“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这样不无绝对意味的语言,认为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得自于他的治学方法——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和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结合,彻底实践了朴学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郭序”引用闻一多写于 1942 年的《楚辞校补·引言》中“给自己定下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来论证闻一多学术研究的目的所在,认为第一项属于

① 《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 卷,第 431 页。本节再引“郭序”,不再注明出处。

“文化史”范围,是文化学术研究的“最高的阶段”,而传统文化中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宋儒还是清儒,则始终在第三和第二阶段上“盘旋”,“陶醉于训诂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文化史研究,要了解传统文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意识,就必须首先超越那个时代和意识,进而客观地理解它、批判它。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超越、了解和批判传统文化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意识形态的前提,就是澄清汇集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的污浊”,于是“为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就是其文化史研究的目的:

他(闻一多)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剖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像的事情。

“批判历史”和“扬弃古代”确实是闻一多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指向,并且由此而构成了闻一多传统文化研究同清代考据学派之间继承与超越的时代特色。如果上面这段引文中的“目的”主要立足于此,那么仍然不失为对闻一多的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但是学术性的文化研究价值在“郭序”看来,归根结底不在学术研究本身,而是为了达到一种“究极的目的”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郭序”所谓学术性研究的“究极目的”存在于研究自身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郭序”引用的1943年5月3日,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五四”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中看出。闻一多在会上说:“刚才张(奚若——引者)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但是你们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被革命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

“郭序”强调说：“他（闻一多——引者）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学的根本态度。”所以，从中“可以看出一多先生以后的活动是早有部署在心的吗？”

这样一来，闻一多传统文化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特征、丰硕的学术性成果，及其透露出来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价值的批判向度等等，就都不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格，而只是为了实现某种“早有部署在心”的“究极目的”的“手段”。这一论断的外在工具性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它与闻一多思想自身的发展的历程不符。

闻一多由“学者”向“斗士”的人生道路的转变，并非受一种“早有部署在心”的“究极目的”的驱使，而是其内在个性特征、学术修养和价值观念中特有的质素，在外在的环境——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主义统治、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生活条件的恶化等等——的刺激下，迸发出来一种无畏的个性化抗争，其矛头直接指向的是专制主义对其教养中根深蒂固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理想信念的戕害。这一转变发生在 1943 年，因为 1942 年下半年，闻一多对当时的政府和蒋介石领导的抗战尚抱有期望和“相当信心”^①，而 1943 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则标志着闻一多这种信心的动摇和转变（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因此，“郭序”将闻一多 1942 年 3 月出版的《楚辞校补·引言》中提出的作为学术研究途径的“说明背景”，作为 1943 年转变之后提出的“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

① “是年（1942 年）先生（闻一多）对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尚抱有相当信心。上半年，某次，先生与长子立鹤步行入城途中，边走边谈，讲到了当时国际国内时事，还谈到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先生说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在望。”（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55 页。以下再引《闻一多年谱长编》，均出自同一版本，故不再注明版本。）

‘思想革命’”的起点,是离开了闻一多思想自身发展的脉络所作出的外在工具性的推断。

其次,是因为“郭序”上述论断的证据不足。“郭序”也认为闻一多的“治学根本态度”形成有一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为此特意举出闻一多的两篇文章——《庄子》和《人民的诗人——屈原》——证明这个过程。《庄子》写成于1929年11月,《人民的诗人——屈原》写成于1945年6月。1929年闻一多任教于武汉大学,开始钻研中国古典文学,大体相当于朱自清所谓的“诗人时期”结束,“学者时期”开始的时期;1945年则是闻一多成为“斗士”的阶段,两篇文章相隔16年,横跨闻一多“诗人”、“学者”和“斗士”三个人生阶段。前者表达了闻一多对庄子飘逸人格的礼赞,对其精神性追求的钦慕,对《庄子》的文采、想像力的服膺,也是对《庄子》睥睨权势的价值观和潇洒放达的生命态度的认同,抒发了一个学者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情思;后者则是一个战士冲锋陷阵时的呐喊,是借古人的悲愤之情表达自身对社会现实的愤慨之心,也是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重新对屈原作了一次政治阐释:“屈原虽然没有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①于是,根据闻一多的两篇文章表现出的论点,“郭序”总结道:

就这样,闻一多先生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而他自己也就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

① 《闻一多全集》第5卷,第30页。据张光年回忆,闻一多1945年发表的《屈原问题》,系郭沫若委托他给闻一多的“任务”,因此,另一篇《人民的诗人——屈原》,也与此有关。详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多成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假如屈原果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那么，有了闻一多，有了闻一多的死，那“唯一”两个字可以取消了。屈原由于他的死，把楚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缘，闻一多也由于他的死，把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缘了。替人民报仇者，人民亦必为之报仇；为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为之催生——催向永生的路上行进。

仅仅从“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是得不出闻一多完成了“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向“人民意识”转变的结论的。这里的关键是“人民意识”与闻一多思想转变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缺乏闻一多思想内涵色彩的抽象描述，即脱离闻一多思想实际历程而用“人民意识”来抽象地规范它的发展。于是，从“把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缘”这一“人民意识”出发，“郭序”对闻一多思想发展的历程作出四个方面的规定：（一）闻一多的诗学思想发展道路：新月诗人→人民诗人；（二）闻一多的学术思想发展道路：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人民意识；（三）闻一多文化史研究的目的：“为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四）闻一多文化学术研究的性质：“人民本位的中国文化批判工作”。至此，半个世纪以来的闻一多研究的“基调”——着眼于闻一多思想转变尤其是从“学者”向“斗士”转化的政治性价值和功能，而比较地忽略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内在思想逻辑——被确定了下来。

直到 80 年代初期，国内学术界关于闻一多研究的思路 and 评价，大体不出以上几个方面。远的不说，仅举几部成书于 80 年代以来的闻一多研究专著为例。一部 80 年代初出版的书是如此评价闻一多诗人、学者和斗士的一生的：“二十年代的诗人只点起了一支红烛，那微弱的光焰又何能‘烧沸世人底血’，又何能‘创造光明’，最多只照见一泓绝望的死水罢了。以后诗人退入书斋，变成

了辛勤的学者,然而秉烛夜读,烛照三千年的文化史,能够照见一条扭转历史动向的光明之路么?用意至善,可惜光焰太弱!抗战爆发,闻一多离弃书斋奔到旷野来了,举目四顾,呵,遍地都是火种啊!天真的诗人原先想以烛光烧沸世人的血,不行,现在却让遍地的火种熏得他浑身血液沸了。可见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熊熊大火冲天而起了,照亮了闻一多的眼睛,他才清晰地看到历史的车轮在转向了,转向一条康庄大道了!是千千万万个奴隶高举火炬,给闻一多照亮了前途,并且冶炼成了他灿灿发光的人格。闻一多的路,是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路。”^①在这里,闻一多思想的内在逻辑、个性特征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其思想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变完全是外因“照亮”的结果;另一部出版于80年代后半期关于闻一多美学思想的研究专著,将闻一多的思想发展视为由“前期”的“朴素唯物主义”,“中期”的“复杂的两极性矛盾的统一体”向“后期”的“开始确立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并能以辩证思维方式分析艺术的社会功利性与艺术的美感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逐步地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美学观相吻合”^②的过程,闻一多思想自身所具有的质素、结构和个人性特征,仅仅是从“朴素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并且最后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美学观相吻合”的注脚,思想者的个性只是某种意识形态共性的说明书;还有一部出版于1996年的关于闻一多诗学思想的书是这样描述其思想发展的:“闻一多接受西方现代文化观念,经历了接受西方美育思想→维护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接受马克思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演进阶段”,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他提出了一个认识与评价历史人物的新标尺:人民性与时代性。……为什么屈

① 时萌:《闻一多 朱自清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② 俞兆平:《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原是‘人民的诗人’？是因为他从贵族阶层中被踢落下来，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他的主要作品《离骚》取了人民的艺术形式，其内容是‘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他唤醒了楚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并把它提高到爆炸的边缘，他的‘行义’是人民的，他的忧郁是时代的。”^① 其中对闻一多思想的功能性评价，与 50 年前的“郭序”相比较，从内涵到文字，都没有什么区别。

这几部闻一多研究的专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认为闻一多思想转变的基本原因在外而不在内。笔者无意否定闻一多思想变化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只是想强调上述三位作者的外因论观点具有代表性，反映了近几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外在工具性趋向：都是从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制度变更层面着眼，用某种并非出自闻一多自身的思想路数，而是某种外在既定的思想模式来衡量、评价、剪裁其诗学、学术和人格中的文化思想及其学术价值。这类由外而内以外为主的结论，在赋予闻一多许多预设的政治和思想光环的同时，也将其诗学特征、学术个性和文化人格中与这类政治功利潮流不相符合的色彩，或者予以忽视，或者解释为向着某种既定理念过渡的低级阶段，从而重复论证了“郭序”的四条“基调”。我们很难从这些论述中看出作为闻一多本人的思想特征及其内在逻辑的发展演变。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和研究，闻一多在由“学者”向“斗士”的转变过程中，由其个性、教养、学识、气质和理想追求等因素组成的“内在质素”起了主要的、基本的作用：

我们在理解作为斗士的闻一多时，不能忽略了他的学者底蕴和诗人气质——中西文化交汇而形成的教养、对“人性”的形而上价值认同，以及其价值理性层面上的人生境界、理想

① 唐鸿模：《诗人闻一多的世界》，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212—213 页。

加浪漫的斗争方式等等。这种人格底蕴同现实层面对专制主义践踏民主和人权行径的仇恨,以及对民盟和政治协商所寄予的厚望,这些多重的因素聚合,构成斗士阶段的闻一多内外两层相辅相成的整体质素:其人格底蕴构成的内在质素使其自然地趋向于“民盟”的“中间路线”,反映出他对欧美式多元化政体的亲和与认同;而对国民党专制和腐败的仇恨,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共产党的好感乃至认同,构成其斗士整体人格的外在层面。这样内外层面的划分,才能理解为何在1944年秋天就已经明确表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闻一多,却在1945年春天以来对民盟主张的多党制政体模式所表现出的热情。并且由于1945至1946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这两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人格层面得以相安无事而暂时并存。这是我们今天理解1946年6月26日,即距其于7月15日壮烈牺牲前20天,在民盟云南省支部第一次招待会上的讲话——《民盟的性质与作风》——的基本背景。讲话的中心论点,是证明“同(民)盟本质上的中间性”,即对多党制政体前途的内在信念……(见本书第十一章)

这样一来,闻一多思想的转变过程,就被理解为一种由内而外以内为主,内在质素和外在层面相互影响、作用而构成的有血有肉的辩证的思想逻辑演化过程;而将这一演化作为结果,又必须仔细梳理闻一多的诗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学术思想,以便进一步理解推动这一思想转变的内在机理。

作为一种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个案发展研究,理解闻一多就是理解我们自己。从这个层次上看,这种研究视野由外而内的调整和置换,有这样三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一,朱自清关于诗人、学者和斗士“三重人格”贯穿闻一多的一生并在不同的阶段“或隐或现”,即在人格发展层面上进行闻一多思想研究的设想,